

=====
文革博物馆通讯（一〇〇三）·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一七一期（zk1904c）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二〇一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出版）

本期目录

【往事非烟】	我因炮轰中央文革坐牢	陈人康
【研究报告】	中苏分裂与“文革”时期中国外交	李丹慧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往事非烟】

我因炮轰中央文革坐牢

· 陈人康 ·

文化大革命是北京红卫兵从66年的夏天开始闹起来的，我的印象好像是人大附中发起的。主席第一次“8·18”接见的红卫兵主要是中学生。虽然文革第一张大字报出自大学，但是红卫兵组织造反的还是从中学开始的。文革第一阶段，首当其冲的就是造“走资派”的反。那时候全国文革都是以红卫兵为主力，要写文革史，不能不提这一段。当时由于毛主席支持，所以“红卫兵”运动一炮走红席卷全国。上街破“四旧”，涉及到一些“地富反坏右分子”，“抄家、批斗”在北京来说还是比较普遍的。我当时没有直接去抄过家，但是别人抄家，我跟着去看过，好像是在前门那个地方，抄了一个四合院里戏剧演员的家。我那时候岁数小，对戏剧不太了解，把人家的戏装和旧照片、结婚照、剧照都算“四旧”扔了一地。我估计那是当年比较有身份的名演员，但是我现在想不起来了。当时把主人轰走，就住在人家家里，这是初期的情形。

当时我觉得对我们影响最大的主要在两个方面，在社会上是破“四旧”，在学校里就是打倒“师道尊严”，不把老师当老师，给人家老师剃阴阳头，对校长搞批斗，让一些老师去打扫厕所搞卫生。师生关系本来就是教育和被教育的关系，肯定是老师管学生，可能有些学生不那么爱服从管教，文革初期一下翻过来，学生成了造反者了，而老师成了“师道尊严”的代表，属于要被破除的那一套东西了。我念小学在十一学校，早期是军委子弟学校，上中学是在育英中学。文革初期，师生的关系换位、颠倒，甚至有人格侮辱之类的事情，我印象可深了。当时我们育英中学好几个老师都被剃了阴阳头，一半有头发一半没头发，而且是女老师，男的就给留几撮，后面的头发全剃掉，反正是怎么丑化老师就怎么干。那个时候完全是处于一种无秩序、无政府状态。公检法，包括政府都瘫痪了，都是红卫兵说了算。由此发展到全国“大串联”。北京这把火烧到全国，然后到处去“破四旧”，到处去“造反”。

我印象最深的还有一个就是文革中的“大串联”，那时候我才14岁，兜里揣了我爸给的30元钱，走了半个中国。我们也就是几个初中生，串联时年龄最大的也不过十五六岁，我算年龄小的。第一站到广州，第二站到上海，第三站到山东济南，然后从济南到了青岛，从青岛坐船渡海上大连。对现在十四五岁的孩子是根本不可能的，没有父母带领，怎么敢让

这些小毛孩儿全国去跑？哪能吃那种苦？可那时候大人都认可，因为那是“革命行动”，毛主席都支持的事大人们自然很难反对。串联对我人生来讲，真是一种历练，小小年纪就坐硬板凳、爬行李架、钻到椅子底下睡觉，始终有一种狂热的激情，当时我们对生活、对物质倒不是特别在乎。那时各地有接待办，到外地有人安排吃，安排住。虽然条件算不上好，反正有人管，手里就凭着一张学校红卫兵的介绍信就可以走遍天下了。所以这30元钱，陪我走遍了大江南北。我觉得这段历练对我们以后的工作生活事业，确实还是很有帮助的。那时候也没有目的和计划，没有到过哪里，就到那里看看。广州因为离北京最远，就去广州，上海过去也没去过，就去了上海，我记得住在同济大学。我共出去串联了两次，第二次是到武汉。我们都住在教室里，学校都停了课，都改成了“接待站”，用桌子、椅子搭成铺，然后铺上席子，我们往上一躺，也不在乎条件的好坏。

第二次从武汉坐船一直到上海，经过整个长江的中下游，视野是开阔了，大串联的旅途上和各地的红卫兵组织有了许多接触，也都处于一种狂热状态。在火车上也好，船上也好，轮流喊革命口号，唱红卫兵歌曲、造反歌曲，形成了一种情绪的串联、情绪的交流。各地红卫兵的那种狂热、冲动和北京红卫兵一样。当时这种经历使我很兴奋，很好奇，“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大家都认定这是革命事业，一种正义的事业，是在做对历史有贡献的事情。正值青春的时期，确实满脑子都是“革命”。

这第一个阶段是造人家的反。第二阶段随着“文革”深入，像我们这些父亲多数都是在职在位的领导开始被触及，造反造到自己头上了。这时候情绪开始有点变化了，有些人就开始对一些做法产生异议，或者持怀疑的态度，后来毛主席又借助工宣队来取代学生红卫兵，称“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再后来工宣队也压不住了，就派解放军“三支两军”来收拾，毛主席先后在不同阶段利用不同的人。到了这个阶段，“红卫兵”转入了低潮。“红卫兵”就不是那么吃香了，特别是一些群众组织出现“派性”之后，他们中间也有了“革命”与“反动”组织之分了。无论什么群众组织只要被中央文革说一句话或者点一个名，这个组织无论你人多势众一夜之内就完蛋。“革命”还是“反革命”？人们无所适从。人开始产生抵触情绪了，还有些人就索性消沉了。原先，认为干部子弟根正苗红，谭力夫的“血统论”风行一时。“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歌和口号喊得震天价响，我们天生是革命的。但是，没有多少时间革命对象也从“黑五类”来发展到“黑九类”，打击面相当大。特别是67年出现所谓“二月逆流”，是文革中斗争的又一个“高潮”。包括叶帅、几位老帅谭震林他们都遭到了批判，叶帅家里都有子女被抓起来了。

正好是“二月逆流”那段时间，我也居然蹲进了共产党的牢。其实66年那时候我已经到部队去了，66年上半年开始文革就不再上课了，我觉得终日无所事事，就向父亲提出要到部队去锻炼锻炼，我当时并没有说要去当兵。父亲看我确实在家没事做，他就同意了，把我送到京西的官厅部队工程兵52师，我到那儿也穿军装戴领章、帽徽，与战士一样。去时正好是年底，那时候部队正好在搞“四好连队”、“五好战士”，部队年终搞评比、总结，整天坐在那儿学习。我一年没上课，已经自由散惯了。一到部队，严格的纪律，然后整天让你在那坐着学习、总结，早请示、晚汇报。这时我要真是想当兵也就当下去了，后来觉得部队这样的生活我一下适应不了，再说也没做好想当兵的充分思想准备，只是脑子一发热就想到部队锻炼锻炼、尝试一下，所以觉得我待了两个月也就够了，于是就回了家。

可是一回家，发现家里变化之大是令我万万没想到的：第一我妈范淑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被抓到秦城监狱去了。事情是这样的：一天突然来人把她从家里叫到工程兵机关大院（实际就是被诬去的），人家那边批斗大会都准备好了，当场将她宣布为现行反革命，戴上手铐就被带走了。原因是她曾说过江青几句话，而且是在文革前在“四清”下乡的时候议论了几句，说江青怎么怎么着，当时谁也没有在意，可文革一来就有人揭发了。文革当中，我

父亲职务是工程兵司令兼党委书记，是一把手，造反派当然要造你的反。于是先借这个事，把我妈妈揪出打倒，“揪范倒陈”借此来打击我父亲。母亲被抓起来时，我还在部队，一无所知，我爸什么也没说也没来过信。等我回家一看，妈被抓走了，老爹与造反派周旋也不回家住，两个妹妹也不见了（被我爸送到老战友家）。哥哥他们当兵当得早，62年、63年就入伍了，家里就没人了。好家伙，偌大的房子就剩我孤身一个了。心情就非常郁闷，正好我对中央文革借“二月逆流”整老干部挺不满。于是我就写了几张标语，内容就是炮轰中央文革，就往墙上贴，当我晚上贴在电线杆子上时，在大街上被海军的人看到了，他们一看是我，就把我逮着了，问我哪儿的，我说我是工程兵大院的，然后就把我送到工程兵保卫部。本来我以为没有多大事，父亲知道后一定会把我接回去的，没想到结果回不去了，我被关到了工程兵的警卫排。事情肯定报告我爸了，我还寻思着我爸会说句话把我放出来呢，结果老爷子愣没吭声。三天之后，到了3月8日妇女节这天，公安局专门来了两个人和一辆小轿车把我从工程兵的保卫部送到公安局。起初我还以为是回家，结果一问是去公安局，才知这下真回不去了。那是个看守所还是拘留所，我一直没搞清。只是那个楼，我至今印象很深，楼成K字型，中间一个大的连接点，就像一个蜘蛛似的，不同方向分出好几个走廊，一共两层，密布着铁丝网。我刚开始进去没什么感觉，但是我一看到阴惨惨的荧光灯映照下的铁丝网不禁打了一个寒颤，一下子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不过还算优待，我进去时没戴铐子，我从3月8日一直蹲到4月23日才被放出来。

4月22日，我们被放出来了，这一共关了一个半月。这里关了几百号人都是所谓的“联动”分子，男女是分开关押，放风在一个院子。反正都是为了“炮轰”、“冲击公安部”这些事。这些“子弟们”全都被抓起来了。我一开始并不知道里面关了这么多人，差不多轮流一天放一次风，这才知道进来了这么多人。牢里一天两顿窝头，早上俩，晚上仨，晚上三个窝头比早上两个要小，一开始吃不进去，后来又不够吃。在里面就是整天盼着吃饭。肚子饿，没油水。当时也没让带换洗的衣裳，后来家里送来的。这段历史，我觉得还值得一说，进去的时候，墙上写的是“庆祝三八妇女节”。真正在里头的时候，你希望他来提审，因为你被抓进去了，就希望早说了早出来，该怎么着就怎么着。要不然人家不理你，你反倒着急。其实有什么事？我不就是贴了几个标语，也是因为我家受了冲击了，原因就在这。

我们在牢里头，关在一起的好像还没有刑事犯，同号的倒有三教九流，与我同号的记得有一个新疆大学的大学生，还有一个顺义县的农民，他的罪名好像是因为说错话，还有工厂里的工人，这几个人虽然身份不同但都属政治问题。我们在里面没事的话就是聊天，聊大家都是为什么进来的，那时候公检法也没有拘留期限这一说，也没有宣判，大家都是听天由命。但是我倒是很相信毛主席的，我想我们这些人关在这里，毛主席肯定不知道，毛主席要是知道，肯定会放我们出去，我坚信这一条。后来我才知道，这里关了不少人，像董必武的儿子董良翮、陆定一的儿子陆德。我们在一起洗澡时，当时听他说“我爹的问题不弄清楚，我就出不去”。牢里管走廊叫“筒子”，“筒子”两边就是牢房。董良翮是董必武的儿子，我印象很深，他被关在我们那个“筒子”的第一间，他是第一号，与陆德一间，我是最里头的那一号，中间大概隔着有十来号，每间最多能关六个人。一条约一尺高的大木板通铺，犯人一个挨一个睡，角落里搁个小便桶，尿尿就在里头，屋里充满尿骚味。一天安排一次上厕所倒尿桶，两个礼拜安排洗一次澡。刘少奇是所谓“最大的走资派”。他的儿子刘允诺也关在里面，但是他岁数比我们大，他是留苏的。那时候我14岁，我看他大概得有40岁了，而且他比较老相，就和老头似的，而且他是单独关押，不像我们几个人在一个号子里，他放风都是一个人放。他的结局挺惨的，他是自杀的。当时我们看到他确实很抑郁，他被完全隔离，压力肯定很大，那种感觉，是“永无出头之日”。我当时想，像我还寻思着要是毛主席知道能放我，还有个盼头。像他，毛主席已经把他爹打倒了，他哪儿还有出路？陆定一的儿子比我们也大很多，是清华的，他当时就说“我爹的问题解决不了，我就出不去”，他很清醒。董良翮岁数也比我们大，当时他们好像是高中的，应该比我们大。

在里头待了四十多天，是我在文革当中最刻骨铭心的一段历史，对我人生有很大帮助。为什么呢？在牢里我就反思“这地方，我不能来第二次”。失去人身自由太痛苦了，因为狱里没有刑事犯，就没有狱霸，没有牢头，都是政治犯，所以就没有挨打受欺负。而且那些公安对我们也还算比较客气，因为也就是个14岁的小毛孩。看我那么小，他们有时候还优待优待我。到吃饭时间，就看着那个炊事班的犯人，挑着饭桶菜桶就来了，那就是上百人的菜和饭。4月份菠菜便宜，所以就没完没了地吃菠菜，菠菜里面搁点团粉做的素丸子，搁点酱油，连汤带水的就是你的菜。一天就两顿饭。一开始吃不进去，因为肚子还有油水，到后来不行了，时间长了，那东西不禁消化，而且我们那时候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早早就饿了。下午三四点钟就早早吃完了，到晚上九十点钟睡觉还早着呢，过了五六个钟头早消化完了，只能饿着肚子睡觉。在里面唯一可看的书就是《毛选》，没有广播，也没有报纸，只好看《毛选》，只能瞎聊了。但比起刘允诺，我们好多了，旁边有个人，总比单个关着好。成天一个人关着，是一种折磨。没人说话，没人交流，终日没事干。后来我听说刘允诺就得了精神病，单独被关押，一定也是原因，真是太悲哀了。

那会儿我就盼着人家来提审，这样的话你可以出去走动走动，可以和人说话。而且提审的地方，不是在牢房，要到前头的办公区，这样就可以出来走动走动，晒晒太阳，见见阳光，这时就特别高兴。还有就是盼着干活，当时让我干的活是搓煤球，反正劳动力我有得是，警察让我搓烤火用的煤球，还美得我屁颠屁颠的，我觉得别人还没这机会呢，好不容易出来活动活动，有点事干，日子就没那么枯燥。警察二十四小时轮班上岗，他们晚上吃的东西是从我们吃的东西里面舀出来的，那时候是计划经济，粮食定量，他们也没有太多东西吃，他们就把犯人吃的东西弄来当夜宵吃。有时候他们从炉子上给我碗汤，或者给我个窝头，就算是对我很优待了。我觉得警察对我还不错，我倒没有受太多的虐待。当然提审时老说你不老实，老说你交代不清楚，后来才懂得这是一种心理审讯的技巧。我的脑子真是挺简单的，没那么多弯弯绕，也没那么多的背景，反正就是想不开了，对中央文革不满，贴几张标语，发泄发泄，谁也想不到会被关进大牢。

后来事情的发展很有戏剧性，果真如我所想，毛主席真知道了。我进公安局的事，被写成报告上报中央，最后报到毛主席那里去了。毛主席看了挺高兴，他老人家大笔一挥批示“大义灭亲，立场很好”，因为我是被我父亲送进去的，并不是公安局来逮的。当时工程兵完全可以把我送回家，司令发话，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吗？因为那时候我父亲毕竟还是司令，但是我父亲坚持将我送到公安局。送进去以后，这事七拐八拐的报到了毛主席那里，文化大革命那时候有那么多繁重的党政军务要批示，毛泽东还真给我的案子单批了“大义灭亲，立场很好”，这是批给我爸爸的。后来江青在当年军委扩大会“为人民立新功”那个讲话当中，还再次点了我父亲，“陈士渠，你那个儿子管好了没有？”社会上很多人误认为是指我哥哥，没想到其实是我这个小屁孩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案”。毛主席亲自批示加上江青点名，这件事在当时来讲也算是一个影响比较大的事件，用现在的眼光分析似乎似乎荒唐，一个14岁未成年的孩子贴了几条标语成了共和国最年轻的政治犯。这段经历对我成长影响很大。我在牢里就对自己说，这种地方，今生不能再来第二次。违法乱纪的事不能做。这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感悟，这真的是一种切身体验。

释放的过程也非常富有戏剧性，我们在拘留所里对外面的世界当然是什么都不知道，反正一个半月就是天天吃饱了等天黑。4月22日晚，突然从里往外叫人，第一个就把我叫出来。释放的那一批人，站满一个篮球场，整整拉了四大客车。我是第一个被叫出去站在球场上的，叫出去以后，警察就把我领到篮球场。我什么都不知道，根本没觉得害怕，有机会出来我倒挺高兴，反正不管是干活还是提审，能出来我就高兴。当时我也觉得奇怪，因为时间很晚了，晚上十点，都半夜了。平时虽然我们睡觉是不关灯的，灯通宵达旦地开着，规定睡

觉后不许再说话。但4月22日的这个晚上，那么晚，非但没有宣布就寝，还被拉到篮球场，我就觉得有点反常，但是我怎么也没有料到是要把我们放了。陆陆续续的人都被叫了出来，我开始觉得肯定有什么事情，莫非要把我们集体转移，可又没让带东西。当时有种种的胡乱猜想，只见人越来越多，包括董良翮他们都来了。那天晚上人到齐了以后，就上了四辆大客车，我们第一车都坐满了。座位之间站满警察。一开出监狱大门，这帮人就开始唱歌了，唱什么？“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这是红卫兵初期的造反歌。警察训斥了两句，也没有人理他，警察也没有特别坚决地制止，这歌居然就唱完了，这颇令人意外，记得董良翮深有感叹道：好久没听到这首歌了。警察都默默站着不说话。最后车子开到了我们所熟悉的人民大会堂。我当时就觉得“有戏了”，要是拉到监狱去，就只要一个地方，可现在到了人民大会堂，这可是一个共和国不同凡响的神圣殿堂，绝不是犯人该来的地方。到这儿，我们是身份肯定应该有所变化吧。这个直觉很强烈。但当时戒备森严，红地毯两边全是“8341”的，隔几米一个军人，沿走廊红地毯两侧全都佩枪站立。那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这些军人，倒是他们佩戴的“为人民服务”的五角星毛主席像章。这款像章才刚刚出来，我们从来还没有见到过。“8341”战士们一人胸前佩戴着一套，就像勋章那样闪烁。文革的时候时兴搜集像章，我们家那时候有各军兵种各军区送来的不少像章。但这种像章我是头一次见到，印象很深。被带到人民大会堂，大家鱼贯而入按顺序坐在那儿。我们终于也有椅子坐了，这是会场事先都准备好了，印象里我们是坐东朝西，面对的是一排会议桌。我估计我们一共有几百号人，就算一部大客车能坐40人，四部车也得160人。我们第一车的人先进去，就坐在最里面。我们就傻坐着，有认识的就相互打招呼大家都挺兴奋，但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进了人民大会堂了，心里不由踏实了许多：即将面临的肯定不会是一个坏结果，要是坏结果，没有必要拉着我们到这里来宣布。片刻之后，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以周总理为首，江青、陈伯达、汪力、关锋、戚本禹一行走了进来，我们当中有不少是因为反对他们（当然没有反总理的）才进去的，现在近在咫尺面对面了。还一个个挺激动的，于是就有人带头挥臂喊起口号“向中央文革致敬、向江青同志致敬”。都是小孩，都是中学生年轻人，场面确实很激动。而且文革初期中央文革是支持红卫兵的，后来就是因为他们不支持了，才产生了一些矛盾。

首先是周恩来讲，然后是江青讲话，最后陈伯达讲话，陈伯达福建口音，他的话听不太懂。印象最深的就是周恩来讲，周恩来一上来就好像是做检讨，大意就是把我們抓起来，当初是得到过他同意的。他说广州有个组织，叫做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与我们的性质差不多，有关部门在请示如何处理上，他批示是可以抓一部分的，但是现在毛主席知道你们被抓了，毛主席说要把你们全放掉。总理说，在这个问题上看来我还是没有领会主席思想，没能紧跟毛主席路线，我要检讨，今天把你们招来就是要深入贯彻领会主席思想。当时周恩来还点了北大附中的牛宛平、四中的孔丹等人，他们都是红卫兵组织的创始人之一，周恩来说“牛宛平来了吗？”牛宛平站起来后。周恩来恳切地讲“你们革命小将、红卫兵，我是看着你们成长的，现在你们犯了错误，我们也有责任”，当时牛宛平他们都痛哭流涕，场面非常感人，大家就一同欢呼口号。接下来江青讲话，她的讲话表演的成分很重。江青虽然在文革当中抛头露面很多，但是我是头一次面对面地看她本人，况且我老妈就是因为说她进大牢，所以我对她也特别比较“关注”一下，由于她是主席夫人的身份，对她关注度更高一些。像总理，原来我们见面机会比较多，因为当时在文革前，只要是五一、十一，晚上天安门广场放烟火，我们都可以上天安门，文革前节日晚会开国上将以上的都可以带家属上天安门城楼。所以那时候中央领导人，像毛泽东、朱德、周总理都聚到天安门城楼上，和大家一块观看烟火。我们见领袖的机会很多，但是江青不来。我还和总理握过手，对总理不陌生，江青是文革后才显露出来的人物。那时候我虽然比较小，可我就觉得她很会表演，不愧是演员出身。当时现场有关方面可能请示如何处理我们，只见她煞有其事地把手往桌子上一拍，很做作的对大家说“毛主席说了，一个不抓，全部把你们放回去，今晚你们就回家。”江青当场宣布释放我们。其实大批老干部子女被抓的事她是知晓甚至指使的，现在总理前面做检讨，

她江青却像没事人一样，没有一句自责的话，还来了个“当场宣布释放”，反过来做“好人”。江青突然这么戏剧性地宣布当场释放，我们一时都惊呆了，大家还都没反应过来，数秒钟后，才好象突然明白过来，只见全场一片沸腾，欢呼“毛主席万岁！”很多人包括我都热泪盈眶，此情此景终生难忘。等几个领导人讲完话宣布当场释放，都已经是后半夜了，绝大多数人当场接见完就直接回家了。可像我们这些年纪小的，又居然跟着回了监狱，多蹲了一晚上。其实我们那时候也太老实，当时后半夜已没公共汽车了，我们住在万寿路西边，要是走回去，也挺远的。我说算了，反正离天亮也只有几个小时了，等天亮了再回去也不迟。散场时军队警卫全撤走了。回到牢里，公安局还让我住那个号子，还把门锁上。依然“犯人待遇”。临走还不忘收我们伙食费，住了一个半月，交粮票多少钱多少写的清清楚楚。回家后我就跟我爸说“人家向我要伙食费呢”，父亲就叫工作人员按数给寄去了。后来我问别人都交没交公安局伙食费，他们说“你真傻啊，谁给他交伙食费，又不是我要住进去的。”还有这么一段插曲，坐监牢还要交公安局伙食费。我在监狱上午吃了早饭后，监狱用车挨个地送，先送城里头的，再送城外头的，然后把我送到我们院的门口，等送到我家时都快中午了。

本来以为我老爸要狠狠训我一下，我捅了这么大的篓子，当时还不知道毛主席专门对我的案子有批示，关押期间也没有人对我说过，根本想象不到事会闹得这么大，都捅到天上去了。我回家后过了没多会儿，中午休息，我爸回来了。没想到我爸一见了我还挺高兴，跟我开起了玩笑，故意逗我“小人康，你这是上哪儿去了？”我寻思说蹲大牢去了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说出口，可是昨晚被中央文革一接见，觉得我这事性质就变了，我不能算是坏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况且是无罪释放，结局也不错，是毛泽东批示把我们放了，什么也不追究了，我觉得这事有点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感觉。所以就坦然说：我上公安局去了一下，接着将昨晚接见之事详细诉说了一遍。我爸坐下就和我说到：你这个小人康已经不得了了，毛主席都知道你了，毛主席对你小人康有批示。“大义灭亲，立场很好”就是为你而批的，你这个小人康不简单哩。毛主席的这个批示，对我爸爸来讲也是一个解脱，不是贬，而是褒，主席赞同我父亲的举动，立场很好、大义灭亲，亲手把自己的儿子都送进去了。所以这点深得毛泽东的赞赏，我父亲认为他当时做了一件正确的事，一件光彩的事情。如果为这事，让他又挨斗挨批的，他肯定生气，但是现在毛主席对他有批示，这可是政治立场的肯定，有了这个“上方宝剑”会使他文革中少了好多磨难。

这是一段四十来天文革人生小插曲，我终生难忘，我们不说是天之骄子，也是共和国的上层。我们小的时候，不管怎么说，靠着父母，待遇比平民百姓还是要好很多。我们上的是十一学校，是军队子弟学校，是寄宿制学校，和社会基本上脱节的。我上在育英中学学习的第一年遇到文化大革命，才算真正接触社会。说老实话，我们这些人没有社会经验，头脑有时候比较简单。我们又不是在社会的大熔炉里长大的，是在一种半脱离社会的体制下长大的。突然一下把我弄到监狱里头，和农民、工人、社会上那些人吃住在一起，对社会才有了第一次的实际接触，和他们海阔天空聊天，农民干什么，工人干什么，还有大学生。我对大学生还挺崇拜的，因为大学生讲起话来比较有水平、有条理。监狱生活四十天确实让我接触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好就好在没有接触刑事犯，要是接触刑事犯，和流氓、和渣滓混到一块，可能就是负面教育。

因为当时我年轻而且幼稚。就这样，才十四、五岁，我就成了共和国最年轻的“政治犯”。我没有任何刑事问题，完全是因为对“文革”的政治观点不同而被抓进去的。清楚地记得，我当时写的标语有这几条，一个是“炮轰中央文革”，一个是“打倒蒯大富”，一个是“炮轰公安部”。释放我们的时候，王力、关锋、戚本禹、陈伯达这些中央文革的人当时都在人民大会堂。然而他们的好日子也不长，没多久也倒台了，那时候的领导人就跟走马灯似的。这段经历是文革当中最富有戏剧性的，也是我人生当中的一笔重彩。

我真正下定决心从军是在68年。牢里放出来后，还是在家闲着，那时还没有复课闹革命呢。进去以后，我也没有觉得太怎么着，因为那里有一大批人和我一样被关着。中央文革接见，毛主席批示放我们出来，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犯罪感，你们想见中央首长还见不上呢。毛主席批示把我们放出来，说明抓我们是抓错了，所以我们出来时还是比较理直气壮的。

我觉得最踏实的一点是档案里什么都没记。第一，初中生没有档案。第二，那个时期学校闹革命，学校里完全都没有这套东西了。我们是从当兵开始才建档案的，档案要有证明人，证明你这段经历，所以这段我不写，档案里也不会有。本来那时候资料也不健全，学校的东西都砸烂了，而且那时候也太小，也没有档案。我入伍才16岁，66年4月23日出生，我真正当兵是68年10月，等于在社会上又漂了一年半。

那时候有些人终日无所事事，索性当起了“逍遥派”。很多人交了女朋友，叫做“拍婆子”，现在演的电视剧里面都有，大街上找女孩子搭话，和人交朋友，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就是成帮结伙打群架，各军队大院的与社会上的混混打，有一部电视剧里有“杀小混蛋”的情节，这是真事，“杀小混蛋”就是我们那几个学校的同学干的。当时育英、太平路、翠微中学，所谓“三校联防”，全是周围一些大院的孩子，一招好几百个，我跟着去过一次。当时号称一个大谭子，一个小谭子，是我们工程兵一个副司令的两个儿子，那是很有名的。正好是这三个学校相邻，都是初中生，一出去浩浩荡荡，全是骑着自行车的，都是军装，应该说在京城这一带是没有对手。我从来没有参与过他们打架，我从大牢里面出来，就对自己说这个地方我不能再来第二次，所以那些打砸抢、违法的事，我是敬而远之，但是可以去看看热闹。那时候已经开始复课了，军宣队已经进校了。那天，一伙人去社会路中学打架，我就跟着他们去看。只见上百辆自行车呼啸而至，到了学校门口，自行车都不锁，就往墙上一靠，人就冲进去了，事先都踩点看好了，哪个门，哪个教室，进去就是一顿暴打，打完了抽身就走，骑上自行车溜烟就跑了。军宣队出来，只见被打的人头破血流。当时，有时候是大院和大院之间的打，有时候是大院和地方子弟打，有时候是大院和城里的孩子打，打群架好像有点占地盘的意思，带点帮会性质。还有无事生非，专抢人家军帽，扒人家的大衣的，电视剧里这些都描写过，那时候这些东西很时髦。什么将军呢、将军帽，什么马裤呢，都是五十年代发的那些将校服，穿在身上，那帮子弟觉得很荣耀。所以，那些没有的就去抢，就去扒人家的，拿刀逼着人家脱，抢军帽，抢衣服，抢大衣，还有抢靴子的。这也是没有法制教育，而且很多人父母都关起来了，学校又没有正常的教育。如果成了“黑五类”，那就更没有人会关心你。所以这些人年轻，精力旺盛，总要寻找一些刺激。“小混蛋”就是这样的人，他们一伙是社会上真正的流氓。他拿刀捅人，下手特别狠。最后激起民愤，大家一拥而上，一人一刀找机会把他杀了。据说这小子最后服软了，但是也晚了，人们太恨他了，他不知道扎了多少人，派出所都通缉他，他手里有人命，那小子太黑。

复课闹革命没多久就开始上山下乡了，分配好一点的上工厂。我印象里记得十一学校的王毛点（也是闹将）好像去了兵团，他走的时候，这帮大院子弟们到车站去送他，有几百号人。那天我也去了，我记得那帮哥们，好家伙，把他抬起来，大家哭得眼泪汪汪的。现在的电视剧、影视作品，也有反映这一时期的，这毕竟是一段历史，所以我觉得现在记叙整理还比较及时。

不久之后，我参了军当的是工程兵，因为爸爸是工程兵司令。我去了之后就下连队，当时我们在河南洛阳盖营房，和现在农民工、建筑工人干的活儿一样。我当时才刚16岁，那可是干重体力劳动的建筑工人。大工是管砌砖的，小工是负责供料的，你得搬砖，得提供水泥砂浆，得和水泥，还得把和好的水泥砂浆再挑到大工跟前。砌墙的都是老兵，大工是技术活，小工就是纯体力活。我记得最清楚，当时我去的那个班就是搅拌水泥砂浆的，但是那时

候没有搅拌机，用砖砌一个水泥池，把成袋的水泥撒开，再将水、白灰倒在里头，穿着胶靴用猪八戒使的那耙子搅匀了，那是纯体力劳动。水泥粉尘、白灰溅的身上哪儿都是，当然有工作服（其实就是上交回收的旧军装），现在民工施工都有机械，我们那时完全是靠体力，拿人去拼。砂浆很重，一担一担的水，再加上水泥一倒，那个水、那个灰，闹得你灰头土脸的。搅拌完了，铲到铁桶里头，然后用扁担挑上去，房越砌越高，搭一块板子走上去，晃晃悠悠一天好几十趟，扁担一边一个铁桶，两个铁桶里面全是装满了水泥、砂浆，只能咬牙干。那时候争创“四好连队”、“五好战士”。当时我一去，部队排长对我就说，你不能认为你是司令员的儿子就搞特殊，我那时候思想上还是蛮正统的，知道不能输给工农子弟，让人家看笑话。所以咬着牙干，好家伙，16岁就挑扁担，一天下来肩膀都压肿了。好在部队当时能吃饱，记得当时地方定量每人才二三十斤粮食，部队是45斤，一天一斤半，反正能吃饱。而且部队有个什么好处？部队养猪，逢年过节杀猪，有猪肉吃。我到那儿，一方面干重体力劳动，胃口大开，干活能吃，倒长结实许多。

我们这一代人尽管经历挺坎坷的，但是我并不后悔，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一代的阅历非常丰富这也是人生一种财富。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从学校到工作岗位，平淡无奇，尽管舒适，没经过风没见过雨，一辈子挺舒服，但是我觉得我这一辈子挺充实，没白活，什么都见识过了。就说70年云南大地震，抗震救灾，现在四川5·12大地震，当年云南死的人并不比它少，那时候不能大肆宣传报道。因为我们是工程兵的部队，后来我们配属二炮，调到云南去施工，云南有二炮的基地。我记得很清楚，我68年当兵到洛阳，洛阳盖了一年房子，还是自己建自己住。一年以后，新兵变成老兵了，有了比你还新的兵，我就干大工了，可以拿瓦刀去砌墙了。但是你别说，自己盖的房子平地拔起自己还挺有成就感的。从挖地基到整个房子的落成，包括抹灰、铺瓦，我什么活儿都干过。

我们是1969年的七八月份，调到云南去的，那时候由于贵州武斗，我们运兵车（闷罐子车）从河南到云南整整走了十天，走走停停。贵州地段发生武斗，动刀动枪的，我记得在柳州还停了两天。这下离家可真远了，到了云南，没到半年，1970年1月5日凌晨1点，山摇地动，遇到了大地震。报道的是7.5还是7.6级，我们离震中大概还不到90华里。当时住在离县城两公里的一个油库的院子里，90里外曲江地区完全夷为一片废墟，就像遭了轰炸一样，全是断壁残垣，人全埋在底下了。由于地震在晚上凌晨1时，所以人们都在熟睡，亏我们住的房子是平房，是我们自己盖的，顶上用大木料、大爪铁，一根一根固定好，搭上架子，然后木头与木头之间钉上席子，席子就是墙，顶上钉块木板，木板上铺上油毡，那就是屋顶了，这是一个轻结构的屋架，而且整个木架子都是钉在一起了，是个整体，不管怎么摇都不散架。屋顶都是很轻的油毡、木板，两层大炕，通铺似的。一个人没事，也没有受伤的。当时，我们怎么从床上下来的，都不知道了。就觉地下发出非常恐怖的声音，走起路来地都在摇。后来部队奉命去曲江执行救灾任务，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到那儿，水土不服，身上痒，起疙瘩，挠了也没用，整夜无法睡眠，吃药打针都不管用。别看就相隔几十华里，等我撤回来后，马上就好了，什么药都不用吃，就是我们两个北京兵有反应，别人都没反应，就是水土不服，真的很奇怪。

救灾第一阶段就是救人挖尸体，有的一家子全死了，把尸体挖出来就埋在他们家房后头。立碑立牌的事，就不是部队管的事了。当时埋尸体的任务，部队埋不过来，就叫“地富反坏右”埋，我去看他们埋，他们挖的坑很浅，尸体肚子都鼓了起来，人叠人没几天味道就出来，尸臭味就是戴口罩都挡不住。那么多死人，咱也算见识过。后来我去刨死骡子还是死马，肚子里都长蛆了，腐烂了，为防止瘟疫，必须把它扒出来。哪有现在洒消毒药，当时封闭了现场，都是靠人肩手抬，我戴了四五层口罩都挡不住那臭味，我不能呼吸，几乎是憋着气干。我这辈子就是没真枪实弹打过仗，这是一点缺憾，其他差不多都见过了。

救灾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为灾民建房。说老实话，现在政府救灾给灾民住的都是简易房，又快又好。当年我们给老百姓可是就地取材搭茅草房，云南人原本不住草房，住的都是土坯搭的土房、土木楼。当时我们搭草房，他们云南人没住过，说能住几个月，可后来等我两年后离开云南的时候（我是72年离开云南的）。走的时候路过灾区，看见灾民还住在茅草房里头，住得挺好，那时候政府没钱。现在可好，刚住了板房，马上又拨款给他们建永久性住房。我觉得住板房就很不错了，我们那时候部队还住不上板房呢。当时我们部队地处灾区因为抗震救灾调动需要上报，正好部队的顶头上司就是我爸爸，他批了“要予以支持”，救灾部队中我们部队是唯一一支工程兵部队，既然要予以支持，后勤才调拨给我们一批活动板房，那种困难和现在相比真是不能同日而语。大地震我这辈子赶上了几次，76年唐山大地震，我倒是没去，是我妹妹去的，我妹妹陈力当时在北京军区二八一医院，住北戴河，北京也是天摇地动的，我那时已在北京部队机关了。

72年的时候，我就上大学去了，那时候是工农兵学员，这也是一段文革特殊的历史，是文化大革命特有的教育制度。我深感上大学和不上大学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四年南开大学哲学系的学习，确实对我来讲是一个整体上的提升。原来文化大革命初中生造反，没学到什么知识，也比较幼稚，没有更多对知识的渴求。那时候不讲个人奋斗，而是一切服从党指挥，党要你干啥就干啥。工农兵学员上学也有它的优势，第一，工农兵学员来自五湖四海，干什么的都有；第二，都是工作岗位上来的，具有实践经验。虽然我现在还在大学工作，感觉与现在的孩子还是不一样，工作过的和没工作过的就是不一样。现在读我们学校EMBA的都是工作过的，有一定的阅历，有一定的积累，再来学习，那是不一样的，从学校门到学校门成长起来的干部阅历太单薄。毛主席老人家说的“经风雨见世面”这句话我觉得我还是受益匪浅的，大学没有白上，我并不是去混三年混文凭的。一开始要写政论文，说实话，当时我入党申请书都写不好。在部队的时候，我的入党申请书都是我哥帮着我写的。咱们作文没有学过政论文、申请书，咱们作文就是花前月下，描述一点生活上的东西，而政治上的东西，都不知道怎么写。我16岁当兵，18岁入党，入党时我已经是老兵了。但是我上了学以后，在写作方面、在理论上，确实受了教育，有人给你上课、有人培养你学习，那是不一样的，有高等学府的大学老师、教授们给你讲逻辑学、心理学、哲学史、中国历史、国外历史。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大幅度的提升。我们那时候学习三年，有半年先打基础，因为不是按正常来的，先要学一些理论。反正这也是一段特殊经历下的特殊学习，由于来自工农兵仍不能脱离群众，在大学里还照样支农，干活，插秧、麦收。大学后面就是农场，我们都到那儿干过活，挠秧、施肥、收割，全都干过。住在老乡家里还搞社会实践，给人上理论课，不管怎么说，对政治宣传这一套，那时候还是挺执着的，一有什么毛泽东最新指示，不管多晚，上街游行，挨家挨户去宣传，还有早请示晚汇报，在部队这套东西搞了不少。虽然过去半个世纪依然记得清清楚楚，这辈子怕是忘不掉啦！

说点题外话，上大学时我和吴晗的女儿吴小彦曾结识还谈过一段“恋爱”，虽然吴晗那时是全国闻名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遭批判后离开人世，但我仍和小彦保持了一段交往，可以说其中也有同情的因素。她曾到天津南开大学找过我，我请她吃的饭，彼此也通过信，但她信中的文字水平确令人无法恭维，想想她比我还小，只有小学没毕业的文化，与他那满腹经纶的老爸吴晗父女两代人的落差，令人唏嘘真使人感慨万分。小彦后来的结局很惨，她由于背上父亲问题的压力，患上了精神病，年纪轻轻早早就过世了。

现在我们这一代“50后”也步入老年了，现在我都奔着60岁去了。历史总要有有人把它记录下来，留给后人去评判，历史就是历史，把它忠实的反映出来，把它记录下来，要不然随着经历过历史的人们的衰老，历史就保留不了了。文革中的红卫兵袖章、毛主席像章我现在还依然保存着，毕竟是一段亲身经历，人走了东西能留下，东西久了就是文物，我相信文革中的物件最终也会体现出它的价值。

□ 来源：《中学生的文革岁月》第二集

~~~~~  
【研究报告】

中苏分裂与“文革”时期中国外交

• 李丹慧 •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外交有着深厚的中苏关系的背景。1960年代初，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破裂的结果一方面导致了“文革”初期中国极左外交路线、方针的推行，另一方面又提供了中美关系缓和的转机，促使毛泽东在加速对外战略策略调整的进程中，及早察觉和扭转了外交领域的动乱局面，并最终确立起联美抗苏的战略大思路，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策略思想，使中国摆脱了两面对敌的不利处境，取得了重大的外交成果。与此同时，也正是由于中苏交恶的阴影笼罩，而致“文革”时期中国的外交思维和外交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阻隔，对苏联和东欧的政策和策略在某些方面缺乏灵活性和调整余地。中苏分裂的背景因素赋予“文革”时期的中国外交以大落大起的鲜明特色，使“文革外交”成为建国以来中国外交事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由“非常”到“准正常”的特殊阶段，为以后中国的外交工作逐渐纳入国际舞台和国际交往的正常轨道准备了条件。

—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的外交工作由于中苏分裂，反帝反修，特别是反修色彩愈益浓重，以美苏划线，对美国、苏联的盟国和与其接近的国家，或定为“帝国主义的走狗、帮凶”，或视作“修正主义的伙伴”、“赫鲁晓夫的走狗”，〔1〕皆为攻击的对象，推行了一条四面出击、打倒一切的极左外交路线，极大地干扰了国家外交方针、政策的正常制定与实施，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使中国的外交环境急剧恶化。

“文革”初期外交领域的混乱状态主要表现为：

（一）夺权风潮波及外交部等外事领导机构，国家外交大权一度旁落，外事工作失控。

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论点指导下，林彪及江青、康生等中央文革主要成员插手外事工作，全面否定建国17年来外交工作所执行的正确外交路线和方针政策，否定外交工作所取得的成就，并把强加给外事工作的“三和一少”修正主义路线的罪名，再上纲为“三降一灭”。外事部门大批领导干部遭到揪斗，夺权风潮普遍波及外交部等外事领导机构。1966年9月9日，毛泽东在一封来信上批示：要求一切驻外机关“来一个革命化，否则很危险”。中国驻外使领馆即开始搞“四大”，驻外大使几乎全部应召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国驻外机构的正常工作受到极大影响。1967年2月7日中央发电指出内外有别，使、领馆一律不准搞“四大”之后，各驻外使、领馆才基本稳定下来。

〔2〕

随着1967年全面夺权的开展，全国动乱升级。林彪、江青、康生等人进一步插足外事口，鼓动揪批陈毅，夺取外交权力。7月，江青等人借毛泽东让王力过问外交部运动之机，再次鼓动外交部造反派夺权。在关锋、戚本禹等人操纵下，北京外国语学院和外事系统的一些造反派，在外交部大门外“安营扎寨”，静坐绝食，要求揪斗陈毅。8月7日，王力

对外交部造反派发表谈话说，“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现在外交部还是原班人马”，“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还是三结合班子好，以革命造反派为主体”，“让我们共同努力把外交部搞成彻底革命的外交部”。〔3〕16日，外交部系统的造反派即冲砸外交部政治部，查封外交部党委，宣称夺了外交大权，擅自以外交部名义向中国驻外机构发号施令。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乔冠华等人被押上街头卖红卫兵小报，几乎所有大使、参赞、司局长都遭到揪斗。国家外交大权旁落，外事领域失控的局面进一步扩展。8月22日晚，在北京发生了由几十个造反派组织制造的万人围攻英国驻华代办处，火烧办公楼、批斗英代办的事件。与此同时，还发生了造反群众砸印度、印尼驻华使馆和准备冲缅甸驻华使馆的事件。

（二）热衷于搞世界革命，以中国为中心，通过全球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战争，一举消灭帝修反。

“文革”时期，中国推行一条唯我独革，四面出击，打倒一切的外交路线，“中国是世界革命中心”之说风行一时，外交工作进一步走上反对帝修反的所谓“革命外交”道路。1965年9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林彪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提出：毛泽东关于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理论，“对于今天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特别是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更是突出地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今天的世界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由此，“文革”开始后，中国将“正在临近”的世界革命的希望寄托于亚非拉，实施世界范围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积极输出革命，不但支持那些尚未取得政治上独立的国家进行武装斗争，而且还鼓动一些已获政治独立的国家继续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走非资本主义道路。1967年3月20日，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中国对世界革命起决定因素，“中国不倒”，“世界就有希望”，“中国一片红，就等于整个欧洲一片红”。根据毛泽东指示，这个讲话的录音向全军人员和全国红卫兵播放。中共中央并印发了这篇讲话。〔4〕同年11月6日，林彪在庆祝苏联十月革命50周年大会上又提出要把“祖国建成更加强大的世界革命根据地”。〔5〕“中国是世界革命中心”的信念致使一些外事工作人员采取种种所谓革命行动，与“帝修反”进行面对面的抗争。1967年1月，中国留欧学生69人回国途经莫斯科，在列宁、斯大林墓前集体朗读毛主席语录而被苏方军警围攻殴打。国内群众开始在苏驻华使馆周围游行，红卫兵在北京机场围攻了苏联撤回国的外交人员家属。1月至2月，在北京发生了多起红卫兵围攻捷、波、匈、保等国驻华外交官的事件；一些红卫兵还非法越过国境，到越南、缅甸等国去参加反抗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实际斗争”。

（三）不顾内外有别的外事原则，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对外活动的中心任务，强加于人。

1967年11月6日经毛泽东审阅发表的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一文，把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出这一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树立了第三个伟大的里程碑”，宣称“世界已进入毛泽东思想的新时代”。由此，外事工作一度突破了内外有别的原则，把宣传毛泽东思想作为外事活动的一项主要任务。《毛主席语录》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泛发行，毛主席像章也被作为革命的标志输出国外。在中国边境地区，一些造反群众用高音喇叭向朝鲜等邻国宣传“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思想；在一些国家并发生了中国驻外人员强迫华侨学生或外国人佩戴带毛主席像章、接受中国的政治口号和个人崇拜的做法、接受“文化大革命”的宣传等事件，引起驻在国的忧虑和反感。

上述“文革”初期极左外交路线及外事领域动乱局面的形成有着深厚的中苏关系恶化的国际背景，其与毛泽东的对苏认识、中苏意识形态分歧乃至两党关系破裂、两国关系急剧恶化的进程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可以说，中苏分裂构成了“文革”初期中国制定外交路线和方针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其一，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中苏两党在内政外交政策上发生重大背离，〔6〕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欲把中国的军事、外交纳入苏联的战略轨道，从而对苏联产生了极度的不信任感和戒心，并开始将中国党内及国内出现的意见分歧和所谓“单干风”、“翻案风”、“黑暗风”与赫鲁晓夫联系到一起，寻找这些现象的国际背景，认为党内已经有了赫鲁晓夫的人，如彭德怀，倘若他像赫鲁晓夫那样掌握了党、军队和政权，那么今天我们就可能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他们的处境一样，也可能被杀掉了。〔7〕由此，随着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深入，毛泽东开始把阶级斗争的重点转向党内，提出了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并特别强调“要警惕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提出“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8〕这样，毛泽东在把对外战略的重点逐渐从反对美帝国主义转向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同时，也把国内阶级斗争的重点从防止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转向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的重演，进而在此理论上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既然成为发动“文革”的主旨，自然也就对“文革”时期的外交产生了重大影响。事实上，毛泽东让王力过问外交部运动，就有要“无产阶级革命派”掌握外交大权，在外交领域贯彻其反修防修思想的意图在内。结果，夺权风潮所及，造成了中国外交工作的极度混乱。

其二，1960年代初，中苏两党开始就国际共运总路线、时代、战争与和平、和平过渡、社会主义革命、帝国主义本性等一系列问题展开论争。中国党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为反面教员、批判靶子，在时代等问题上坚持“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等提法的同时，对资本主义的自行调节能力估计不足，对无产阶级力量估计过高，不适当地强调了帝国主义战争的不可避免，强调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的过分乐观的世界革命大前景，强调国际阶级斗争。与苏共意识形态上的尖锐对立，使中国党在激烈的论战中忽视了1950年代以来国际环境中出现的和平因素，国际局势趋向缓和的历史契机，以及世界各国人民追求和平与发展的共同愿望和共同利益，忽视了1950—6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科技、文化大发展所产生的巨大效应，局限于世界革命的认识之中，不仅在国际斗争中继续强调反帝反修，而且把反对各国反动派的斗争提高到不应有的高度，严重扩大了打击面。

其三，由中苏意识形态分歧而致的国际共运大论战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分化乃至破裂，中国在处理国家关系和政党关系方面，以苏划线的色彩愈益浓重。在强列的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意识下，中国党一度以自己的理论、方针、政策为区分真假马列主义的准绳，混淆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是非界限，把对中国现行路线、方针不理解的兄弟党和国家，统统划归修正主义政党、赫鲁晓夫集团，加以反对。这时在毛泽东看来，除了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的走狗之外，还有赫鲁晓夫的走狗。“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了”。〔9〕从而更加强化了中国“唯我独革”的观念，为挽救“马克思、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10〕的局面，对外大力宣传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三个里程碑”的毛泽东思想。

“文革”初期极左思潮的泛滥，极左外交方针的推行，给中国的外交环境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在1966年至1967年一年多时间里，中国同已建交和半建交的40多个国家中的近30个国家先后发生外交纠纷，〔11〕国家关系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在亚洲国家中，同印度、印尼、缅甸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东盟国家对中国更加疑虑和敌视。与非洲国家关系出现倒退。除驻埃及大使黄华外，中国驻非洲国家的许多使馆由造反派掌权，干涉驻

在国内部事务，引起这些国家的严重不满，其中不少国家对中国采取了戒备措施，有的关闭其驻华使馆，有的中断了外交关系。中国与拉丁美洲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和其他交往也受到影响。对欧洲国家，中国只与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关系比较密切，同其他建交的欧洲国家基本没有互访活动。特别是同英国的关系，降到最低点。在此期间，正式派出政府代表团访华的国家大大减少，因各种问题与中国发生争执的国家却大大增多。中国的国际形象及对外关系受到严重损害。

## 二

如果说中苏分裂构成了“文革”以及“文革”初期外交工作混乱和失控状态的背景，那么，也正是中苏关系不断恶化的状况，促使中国在“文革”中期开始调整对外战略和策略。面对1960年代中期以后愈益增强的苏联的军事威胁，毛泽东在对外实施反帝反修统一战线战略的力量分配上，不断加重反修统一战线的分量，开始考虑对两条战线作战的外交战略进行调整，将斗争的主要矛头逐渐转向苏联。

随着中苏两党的分裂，两国国家关系也处于越来越紧张的状态，边界争端持续升级。苏联根据1963和1966年与蒙古签订的防务协定和具有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将军事力量向中蒙边境推进。19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驻蒙军队已达几个师，并在蒙古国建立了导弹基地。这样，与中国边界长约4500余公里的蒙古国，事实上对中国华北、东北、西北三个方向构成了军事威胁。从中蒙边界的二连浩特经张家口到中国首都北京的直线距离只有560余公里，苏军战略军团的当前任务纵深则可达700余公里，完成当前任务的时限为10—14昼夜，而中蒙边界地区地势基本平缓，尤其便于苏联坦克机械化部队的前进及展开。而苏联部署在其国土纵深的洲际导弹和靠前部署的中程导弹可以攻击中国全境；部署于远东战区的远程航空兵如从中国“三北”方向入袭，作战半径可达长江一线。（12）

1968年8月苏联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在6个小时内出兵占领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与此同时，苏联在一系列声明和宣言中提出了“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利益有关论”、“大国特殊责任论”等被称为“勃列日涅夫主义”的一套理论，为任意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制造依据。翌年6月，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上又提出了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倡议。以后，苏联先后派出二十多个代表团到东南亚、日本等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活动，宣传“亚安体系”，试图拉这些国家一起建立一个新的针对中国的包围圈。

面对苏联构筑的对中国的战略包围，以及苏联重兵压境的战略态势，中国深刻感受到了苏联的严重威胁，认为苏联正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最大、最现实的危险。在毛泽东看来，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已取代了美帝国主义的位置，成为中国及全世界各国的头号敌人。这样，毛泽东开始探寻联美抗苏的可能性，着手进行对外战略策略的调整。与此相应，也就不能允许外交领域的无序状态继续存在下去。

对于极左思潮给外交工作带来的严重干扰和破坏，毛泽东早有察觉，并且及时地不断采取措施予以纠正。1967年8月，毛泽东批评王力“8·7讲话”是“大、大、大毒草”。（13）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决定对王力、关锋隔离审查（翌年1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外事系统的动乱局势由此有所缓解，外交失控现象基本得到控制。

1967年11月，毛泽东批示认为，日本安斋库治等人关于日本不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意见是正确的。从1968年3月起，毛泽东又针对外交工作中存在的种种“以我为

中心”的做法，做出一系列批示，要求对外宣传“不要强加于人”，“对一切外国党（马列主义）的内政，我们不应干涉”等批示，并批评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的提法。

〔14〕1969年3月，毛泽东指出极左思潮破坏外交工作的严重后果，说：“我们现在孤立了，没有人理我们了。”〔15〕

1969年5月1日晚，毛泽东、周恩来等在天安门城楼先后接见了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赞比亚、瑞典、柬埔寨、刚果（布）、坦桑尼亚、几内亚等8国新任驻华大使。翌年“五一”国际劳动节时，毛泽东又在天安门城楼会见了亚、非、欧40个国家的驻华使节，同一些使节进行了重要谈话，并与21个国家的使节握手。毛泽东请使节们代向各国元首问候，以此明确表示中国愿意改善和发展同各国的关系。

1970年6月，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反复谈到“文化大革命，乱子多得很”，“今天打倒周恩来，明天打倒李先念”，“现在查出来了，就是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有一个秘密的反革命集团在起作用，叫‘5·16’兵团”。〔16〕7月29日，毛泽东在会见朝鲜军事代表团时更直接点明：有些人“趁机会名为造反”，“在北京砸烧英国代办处，印尼、印度的大使馆也遭殃了”，指责说，“那些人就是国民党”。12月18日，毛泽东又对斯诺说，“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

周恩来、陈毅等人根据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采取了种种措施，对极左思潮的干扰进行了限制和纠正，积极恢复外交关系与修复对外关系。1968年6月，中央派军队干部担任外交部政治部军代表，〔17〕8、9月一批外事领导干部被“解放”；1970年初中央又向外交部派出了军代表。6月，外交部革委会成立。外事工作逐步恢复正常。

1969年春节后，周恩来催促外交部改变我驻外大使空缺的不正常状况，指示无论新任返任的大使，要以阿尔巴尼亚、越南、法国等为第一批。根据该项指示，外交部很快下达了驻这三国大使的任命。〔18〕此后，陆续重新派出一批批驻外使节，使各驻外使领馆由大使等主要负责人回国参加“文革”运动而造成的长期出缺状况得到扭转。

1970年9月和1971年4、5月，周恩来还亲自部署外事部门批判极左思潮，一再指示驻外使馆“如有极左分子应迅速调回”，对外宣传“不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输出，否则要犯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抽象地用一两句毛主席语录搞宣传，“反而有破坏性”。周恩来还分别在国家旅游、援外会议和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做报告，系统阐述党的外交方针政策，批评外事工作中的极左行为。他针对“文革”以来我国同许多国家几乎中断来往，许多方面的活动停止的状况，提出现在是应该“开门”的时候了，表示反对把前17年的外交路线说成是“修正主义路线”，不赞成到处搬用“反对帝修反”的口号。〔19〕

自1970年起，中国同一些国家的关系，又有了明显的改善。中国同肯尼亚、突尼斯、布隆迪、锡兰（斯里兰卡）和加纳等国，或恢复、发展了外交关系，或进行了重要访问，或开展贸易、事务往来新关系，或致电表达相互合作与谅解的愿望。在此期间，在已建交国家中，除与苏联、印度和印尼的关系仍较为紧张外，同其他国家的关系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或发展。在1968年至1971年7月中国实现外交局面新突破之前，亚非拉、欧洲、北美有11个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20〕

由此观之，中苏关系恶化的结果又使“文革”时期的中国外交工作比其他领域较早地摆脱了混乱状态，较快地回复到正常轨道，受破坏的程度要轻些。这即为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完成对外战略策略的转换，提供了组织上、思想上和社会心理上的准备。

### 三

中苏关系紧张加剧的国际因素不仅作用于毛泽东及早采取措施，扭转了中国外交关系的不利局面，而且还促成了毛泽东晚年对外战略策略思想的重大突破，使“文革”时期的中国外交走上了较为现实可行的道路。

考察1960年代中期以来毛泽东对中国外交战略策略进行思考，不断探索调整的历史过程，曾经有过以下多种提法：

#### ◇ “两个中间地带”

1962年1月毛泽东在接见日本客人时，对其1940年代提出的“中间地带”观点做了新的补充，指出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各不相同，将英法等殖民主义国家、拥有强大垄断资本的西德、日本与独立和半独立的非洲、拉美国家区分开来；〔21〕1963年9月毛泽东又谈到，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1964年1月，毛泽东正式明确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思想，指出：讲到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此后不久，他又将后一部分中间地带的范围扩大到北美、大洋洲和日本，进一步明确了亚、非、拉美是第一中间地带，欧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日本是第二中间地带的概念。〔22〕两个中间地带的划分，“第二中间地带”概念的提出，在分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美国矛盾尖锐化的基点上，揭示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拥有共同利益的现实性，为突破冷战时期国家关系中意识形态框架的束缚，结成最广泛统一战线抗衡美苏战略构想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 ◇ “间接同盟军”

1963年2月毛泽东向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谈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问题，提出与美国矛盾日趋激化的法国、西德、英国、日本等国，“是一种间接同盟军”。〔23〕一年后，毛泽东又特别谈到，两个中间地带都反对美国控制，东欧各国则反对苏联控制；强调中国与第二中间地带国家有着根本的共同点，即反对各种形式的外来控制，不管资本主义大国还是社会主义大国，谁要控制、反对我们，我们是不允许的；世界上两个大国交朋友，一个美国、一个苏联，企图控制整个世界，我是不赞成的。〔24〕进一步表露了中国可以联合第二中间地带这个间接同盟军，反对美苏两个大国控制的战略意图。

#### ◇ “中间集团”

1963年9月毛泽东在同艾地谈话时提出：建立国际反美统一战线，应包括中间集团，即法国等六国集团和英国等七国集团，还有日本、加拿大。〔25〕此概念是“第二中间地带”概念的另一种表述方式。

#### ◇ “两个第三世界”与“中间世界”

1963年10月毛泽东对巴卢库谈到西方报纸关于第三世界的两种说法，一种指亚非拉，一种指西欧共同市场；数月后，毛泽东将此说法概括为第一个第三世界指亚非拉，第二个第三世界指以西欧为主的一批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有些还是帝国主义的国家；其后又提出，“中间世界”即所谓第三世界，中间世界分为两部分，第二个第三世界包括法国、日

本、加拿大，以及欧洲的一些国家。（26）这一提法虽然还是对“两个中间地带”概念的一种混用，但表明毛泽东已在开始考虑把“第三世界”这个概念运用到中国的对外战略策略之中了。

◇ “中国是不发达国家”，属于第三世界

1964年1月毛泽东接见法国议员代表团时提出：要从欧洲的伦敦、巴黎到中国、日本，把第三世界扩大起来。毛泽东这里所说的第三世界还是两个中间地带的内涵，但其突破点在于将中国从社会主义阵营的一极分离出来，归入了第三世界的范围；9月，毛泽东又在同法国客人的会谈中开始将“第三世界”的定义与“第二中间地带”区分开来，单纯与“不发达国家”的概念相连，指出，有两个中间地带，一种是发达国家，一种是不发达国家，就是你们所说的第三世界，而中国是不发达的国家。这即已明确第三世界就是指不发达国家，并初步将中国划入了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行列；1970年代初，毛泽东在会见非洲外宾时说：我们愿跟你们非洲站在一个行列。就是亚非拉，第三世界嘛。我们把自己算作第三世界的。首次明确表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27）

◇ “苏联也是纸老虎”

1964年初毛泽东对法国客人谈到，只有美国和苏联才是大国，一切事都要照他们的办，要到他们那里朝圣。但是毛泽东认为，纸老虎并不仅只美国一只，“苏联也是纸老虎”，指出：我们不信他们那一套，大国来控制我们国家，那不行。（28）这时在毛泽东看来，美苏虽然仍处于两极对立的位置上，但就其与世界各国的控制和反控制的矛盾而言，它们实际已汇合为矛盾的同一面，成为一极。苏联已与美帝这只纸老虎为伍，中国和世界各国不必惧怕它们的威胁，应与其霸权主义政策进行抗争。

◇ “中等国家”

1970年6—7月间，毛泽东在几次接见外宾时都谈到第一、二、三世界，特别留意第一、二世界的提法及其含义，针对“超级大国”的提法，提出了“中等国家”的概念，说美苏那样的超级大国，我们攀不上。强调指出：世界上有那么一两个大国，不仅想吞并非洲，也想吞并中国。但是国际间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决，不能由两个大国来决定。（29）

这实际进一步突出了美苏两个大国对世界构成的威胁及联合国反霸的战略意向。

◇ “两个中间势力”

1970年10月，毛泽东又指出，“第一中间势力是第三世界”，要争取英、法、西德等“第二中间势力”，“这对我们有利”。（30）这种提法已非“两个中间地带”之说的简单混用，其虽在概念的外延上有着部分重合之处，但在思想内核上则有所区别：原中间地带不包括中国，现中国加入了第三世界的行列；原形式上美国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仍处于世界的两极，现不仅实质而且形式也发生了变化。由于斗争的主力和斗争的对象都已进一步明确，这时提出两个中间势力问题，就具有了明显的策略意义。它表明第三世界可作为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中的依靠力量，第二中间势力则是需要争取并联合的力量，由此确定了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同资本主义阵营的国家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反对共同敌人的策略取向。

◇ “一条线”、“一大片”



1970年代初，毛泽东为实现集中力量抵制苏联霸权主义的目标，以改善对美关系为突破口，加速了对中国外交战略进行调整的步伐。毛泽东认为，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能两面作战。（31）由此，他在1973年2月17日会见基辛格和1974年1月5日会见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又分别提出了“一条线”及“一大片”的思想，构想将从中国、日本经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到美国一线，及这条线周围一大片的所有国家团结起来，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

这样至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卡翁达时，最终借用世界上早已有之的第一、二、三世界的术语，明确、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观点。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几天以后，毛泽东又进一步补充他的观点说：“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32）

1974年4月10日，经毛泽东审阅批准，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6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中，第一次向全世界阐述了毛泽东的这一新的战略策略思想：“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加强团结，并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就一定能取得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斗争的新胜利。“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在欺负人方面，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超级大国尤为恶劣”。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剥削人家，“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打倒它。”（33）在国际论坛上公开表明了毛泽东通过划分三个世界，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争取同第二世界国家的联合，集约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政治力量，建立起包括美国在内的最广泛的首要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主旨，以及“不称霸”的主张。这就将苏联最大限度地孤立了起来。此时仍将美苏两霸并提，实质已只是一种形式上、宣传上的需要，美帝国主义在其中仅起陪衬作用。正如毛泽东对基辛格所说：中美要共同对付苏联，有时我们也要批你们一回，说“帝国主义去你的吧”！不讲不行呢。（34）

毛泽东上述提法的变化，尽管有一些概念的重合混用，但其外交思路发展的脉络却是清晰可见的。这个思考过程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建立反帝反修以及反对霸权主义，特别是苏联霸权主义国际统一战线的大思路。这种探索、调整中国对外战略策略的历史过程虽然是以世界格局由两极体系向多级、多元体系转化为前提条件的，其始动力却是中苏分裂及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结果。因此可以说，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战略策略思想确定的过程，反映着1960年代中期以来中苏关系的走向；反映着毛泽东的外交大思路由探索到蕴酿成熟的发展轨迹：由反帝反修，以美帝为世界头号敌人到重点反对赫鲁晓夫集团的反修统一战线的份量不断加码，再至“头号敌人”角色的变换，苏联霸权主义转居世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成为首要的斗争对象，反帝反修对两线作战转化为集中世界一切政治力量，一个拳头出击，抗衡苏联。“文革”时期的中国外交局面由此出现了重大的转机。

#### 四

然而，也正是由于毛泽东把处理对外关系和制定对外政策的着眼点过分集中于中苏两国的关系，因此“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策略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相当的局限性，并且在另一

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致使“文革”时期的中国外交处于一种僵化的而非灵活的、单一的而非多样的状态。

其一，外交思维的矛盾性。一方面，毛泽东按三个世界组合国际政治力量，在多极化国际格局中以国家利益为决定斗争与联合的首要标准，联合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反对霸权主义，联合美国抗衡苏联，从而确立了一种非意识形态化的认识论基础；而另一方面，鉴于中苏分裂的背景与“文革”起源有着内在的联系，因此，尽管中苏对立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冲突，但是在毛泽东的思考中，意识形态上的重大分歧一直成为中苏国家关系冲突和僵持的一种结节，长期难于解开。特别是毛泽东要保证“文革”始终不被从根本上否定，保证其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理论的继续顺利实践，就必须长期保持中国与苏联的对立。强烈的反苏色彩，使这种外交思维不是建立在一种完全正常的国际关系原则基础上的思考。可以说，“三个世界划分”战略策略的理论出发点在于摆脱意识形态观念的束缚，而其落脚点却又陷入了极其厚重的意识形态窠臼。

其二，外交行为的矛盾。由于外交思维存在上述的矛盾性，使实施“三个世界划分”战略策略的外交行为也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一方面，中国在对外交往中突破意识形态框架的束缚，放弃“以美划线”的标准，把对外方针建立在世界发展的现实基础之上，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联系；另一方面，却又仍然没有完全摆脱“以苏划线”的羁绊。如中国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即带有浓厚的中苏分裂的背景色彩。1955年在“中苏共渡‘蜜月’”期间，随着苏南关系的解冻，中国与南斯拉夫也建立了外交关系；1958年中苏之间出现裂痕，于是中国开始发表批判南共修正主义的文章，中南关系中断，双方均撤回了大使；进入1960年代，中国最初也是通过尖锐批判铁托的修正主义来不点名地攻击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使中南关系进一步恶化；而到1968年8月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南共谴责苏联推行霸权主义，谴责“有限主权论”等所谓“勃列日涅夫主义”，苏南关系破裂。在此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基础上，中南双方停止了相互间的指责，中国对南斯拉夫的评价又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又如中国与东欧国家关系，1970年代初以来，中国除将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后期包括南斯拉夫）作为对抗苏联霸权的重要伙伴，着力与之发展关系外，没有明确提出过联合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这即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以意识形态为组合国际力量标准的新的反复。此外，“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提出后，中国与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等东欧国家的关系虽然较1960年代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但对比中国与西欧国家关系的发展，步伐则要慢得多。自1970年代初始，中国与欧洲、北美、和澳洲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建交高潮。至1970年代末，除安道尔等4个国家外，中国与欧洲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建立了外交关系（包括与英国、荷兰关系从代办级升为大使级，同圣马力诺建立领事外交关系）；1975年还与欧共体建立了正式关系。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也于此期前后同中国建交。（35）由此，中国在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迅速得到较大发展的同时，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则还只是处于修复并改善关系的阶段。

另外，从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来看，1960年代初，随中苏关系的破裂，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点开始转向西欧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1964年中法建交后，西欧国家掀起了要求同中国发展贸易的热潮，中国与西欧国家贸易关系在60年代取得较大进展。1970至1979年，随建交高潮的出现，西欧各国同中国的官方和民间贸易往来迅速增加，美国和日本对华贸易也出现了大幅度增长的势头，西方普遍出现了一种“中国热”。与此相对照，在东欧国家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伙伴转为次要对象后，1960年代初，双方的贸易陷入低谷。1970年代后期虽然有所回升，但其增长幅度却远远低于同期中国与西方贸易的增长。（36）

其三，三个世界划分标准模糊且缺乏科学性。上述外交思维与行为的矛盾性，决定了这一问题存在。毛泽东在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时，将整个欧洲都归入第二世界，这即包括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邓小平1974年在联大阐述毛泽东这一思想时，界定说：亚非拉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第一、三世界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但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究竟属于“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毛泽东一直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除外）作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一个整体加以批判，虽然也指出这些所谓的修正主义国家与苏联存在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却既未把它们算作是反对苏联霸权的依靠力量，也未明确提出过将它们同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当成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中可以联合、争取的重要力量。毛泽东只是将与苏联或分离或对立的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纳入第三世界范围，成为中国的亲密战友，反霸的主力成员。由此论之，1977年后中阿关系破裂，阿尔巴尼亚又当归入何方呢？这样，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归属方向实际上是模糊不清的。（37）正是由于“三个世界划分”思想本身就缺少一个明确、科学、严谨的划分标准，它既非完全以发达或不发达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确定国家的归属，也非完全以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划线，从而导致了“文革”时期处理对外关系问题时的局限性。

当然，总体上讲，毛泽东根据1960年末70年代初苏美战略态势和中美苏三国关系变化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并做出了新的国际战略抉择和策略选择，还是颇具远见的，是有突破性的。由于提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不做超级大国，不称霸，把加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中国发展对外关系的基本立足点，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的关系取得重大进展。由于侧重于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中国得以冲破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封锁，不仅同美国关系改善，而且与日本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也继续发展。由此，中国彻底摆脱了一度在国际上比较孤立的处境，国际威望不断提高。中国作为遏制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一支主要力量，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

总之，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在中苏分裂这一背景的深刻影响下，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于国内动乱的局势下，及早着手纠正了外交工作中的偏差，恢复了中国对外交往的正常进程，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出发，在抵御苏联霸权主义威胁的基础上，适时地实现了中国对外战略策略的重大转变，取得了中国外交工作的突破性进展，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愈益积极而重要的作用。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尽管国内动乱，但是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是受到国际上的承认的。中国的国际地位有提高。”（38）中国真正成为了一个世界政治大国。

◇ 待补充材料：

1975年1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阐述了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这次大会通过的新宪法进而赋予了这一思想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使之发展成为一种国策。

到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召开，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首次明确将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作为一个理论和一种战略、策略加以评述，指出“这是国际无产阶级在当代的正确的战略规定和策略规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直至1980年代中期，中国“制定对外政策的基本依据，仍然是毛泽东在世时提出的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39）

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改变了问题的提法。胡耀邦在大会政治报告中虽然继续谴责“实行霸权主义的超级大国”“构成了对世界人民的新的威胁”，强调“社会主义中

国属于第三世界”，但却没有再评说毛泽东划分三个世界的思想，而是强调“中国把坚决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一起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而斗争，看作自己神圣的国际义务”。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也删去了所有类似“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词语。此后在党的重要文献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谈话中，已不再使用这一提法。（李丹慧：《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战略和策略思想的历史考察——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世界历史》1994年第1期，第3—12页。）

注释：

〔1〕1964年5月15日毛泽东与阿尔巴尼亚妇女代表团和电影工作者的谈话。

〔2〕《陈毅传》编写组编著：《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608页。

〔3〕《王力关于外交部夺权问题的谈话（节录）》，1967年8月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文革”十年资料选编》第一辑上册，第220—227页。

〔4〕马齐彬、陈文斌、林蕴晖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91页。

〔5〕《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第303页。

〔6〕详见李丹慧：《五十年代中后期中苏关系的演变》，《党史研究资料》1995年第12期，第2—17页。

〔7〕1964年2月29日毛泽东与金日成的谈话。

〔8〕《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第250、255页。

〔9〕《毛泽东给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文革”十年资料选编》第一辑上册，第80页。

〔10〕同上。

〔11〕《当代中国外交》编辑部编：《当代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9页。

〔12〕参见王仲春：《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苏联因素（1969—1979）》，《党的文献》2002年第4期，第51—52页。

〔13〕《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1949—1989）》，第299页。

〔14〕中共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七个文件汇编：《毛主席关于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批示（1967年3月—1971年3月）》，第2、4、5、6页。

〔15〕1969年3月22日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陈毅、李富春等人的谈话，转引自王永钦：《1969年——中美关系的转折点》，《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第80页。

〔16〕1970年6月11日毛泽东同罗共中央常设主席团委员波德纳拉希的谈话，6月27日毛泽东同朝鲜代表团的谈话。

〔17〕根据笔者采访姚广、罗贵波的记录。

〔18〕王幼平：《翠竹丹心，永照人寰》，《人民日报》，1992年1月8日。

〔19〕安建设：《周恩来领导的1972年前后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党的文献》1993年第1期，第22—28页。

〔20〕参见谢益显主编：《中国外交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1949—1979》，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2页。

〔21〕外交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87页。

〔22〕《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06、508、509页。

〔23〕1963年2月23日毛泽东同契尔沃年科的谈话。

〔24〕《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08、520页；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同日本社会党人士佐佐木更三等人的谈话。

〔25〕1963年9月3日毛泽东同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的谈话。

〔26〕1963年10月2日毛泽东同巴卢库的谈话；《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14页；1964年8月17日毛泽东同阿尔及利亚驻华大使亚拉的谈话。

〔27〕《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22页；1964年9月10日毛泽东同法国技术展览会负责人乔治·皮科等人的谈话，1970年6月19日毛泽东同索马里最高革委会副主席艾南希的谈话。

〔28〕《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21页。

〔29〕1970年7月29日毛泽东同罗马尼亚武装部队长约尼查的谈话，7月11日毛泽东同坦、赞政府代表团的谈话；《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90页。

〔30〕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同缅甸副主席德钦巴登顶的谈话。

〔31〕1972年7月24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姬鹏飞等人的谈话。

〔32〕1974年2月25日毛泽东同阿尔及利亚革委会主席布迈丁的谈话。

〔33〕《邓小平在联大特别会议上的发言》，1974年4月10日，《“文革”十年资料选编》第一辑下册，第28—29页。

〔34〕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同基辛格的谈话。

〔35〕参见《当代中国外交》，第303、307—308、317—318页。

〔36〕

详见《当代中国对外贸易》编辑部编：《当代中国对外贸易》，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271—272、392、410、420—421、454—458页。

〔37〕1977年1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乔木的长篇文章《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文章在对第二、三世界范围的界定上有了不同于毛泽东的阐述，指出：作为国际无产阶级专政柱石的社会主义国家，同受剥削压迫最深、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被压迫民族一起，共同形成第三世界。在美苏第一世界与上述第三世界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38〕《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9页。

〔39〕赵紫阳1982年4月19日接见外宾时的谈话，《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56页。

□ 来源：《党史研究资料》1997年第1期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